

人物專訪

風也聽見詩的聲音 文學看臺灣

當代文學大師 | 國立中山大學余光中教授

日新編輯組



永恆，剎那，剎那，
永恆等你，在時間之外

在時間之內，等你
在剎那，在永恆

炎熱的夏日午后，額頭上豆大的汗珠不斷滴落，剛調整好研究室的座位，余光中教授已翩然到來，貼近了距離，只見他那健康紅潤的面龐、親切真摯的笑容，神采奕奕地引領我們進入古今中外的文學世界。

文學與創作

老師長年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作風也跟畢卡索一般不斷在改變，早年動盪的生活對您的創作有何影響？

我的祖籍是福建永春，但因父親余超英公職的緣故，1928年的重陽節出生於南京，我出生的日子是個詩和酒的日子，菊花的日子，茱萸的日子，所以自稱為「茱萸的孩子」；不過另一方面，重陽節的意義為避難，果不其然，因戰爭逃難的經歷佔據我少年記憶的大部分。

1937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當時才九歲的我跟著母親顛沛流離地逃至上海避難，十里洋場的上海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洋化。拜洋化之賜，小學四年級就開始學習英文，也因此奠定了我的外文的基礎。還好上蒼保佑，不久後接到了父親平安的來信，說他已到了重慶，要我們母子前往會合。我們即刻從上海動身到重慶，途經香港，一路上海天茫茫，回想逃難的日子，歷經風塵，飽受驚嚇，所以母子倆和父親團聚時，恍若隔世。不過戰爭仍未消弭，在重慶，日軍經常來轟炸，致使我的學業被迫中斷，只能斷斷續續地唸了幾個月書。

1939年夏天，十一歲的我總算正式進入四川江北悅來場的南京青年會中學，一待就是六年，直到日本投降為止。1945年的夏季，長達八年的對日戰爭終於在日軍投降後宣告結束，我跟隨著父母順著長江返回了南京，告別了滔滔不絕的嘉陵江，也告別了中學生涯，邁向大學之路。

返鄉之後，我先後考取了北京大學和南京金陵大學，但可惜外患之後又有內亂接踵而來。當時國共內戰開始蔓延，北方已經動亂，母親擔心我的安危，堅絕反對我進北大，我只好選擇金陵大學外文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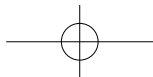
至今回憶起來仍不無遺憾。

我的大學之路崎嶇難行，與金陵大學也只有一年半的緣分，後來轉往廈門大學，但也只讀了一學期，仍生活在戰亂之中，後來又因整個大陸淪陷而倉皇逃到香港，在香港失學了一年，但生活較為平穩些。直到1950年年中，我隨母親自港來台，正值舟山撤退，臺灣岌岌可危，七月韓戰爆發，美國派第七艦隊協防臺灣，臺灣局勢始逐漸穩定下來。同年九月正式考進台大外文系三年級。

這種災難的歲月，對於一個人的心靈有一種壓力，就是不吐不快，所以到了中年以後，此種記憶不斷地回頭衝擊你，就會產生創作的靈感。

華人地區我幾乎都住過，我離開大陸時已經廿歲，在香港待了十一年，南洋各地也都去過，在美國前後也居住了五年，澳洲我也常去，所以各地的華人情況我都了解一點，就是各地華人為什麼會講那些話我都了解。例如為何香港人最富愛國精神；天安門事件時有幾十萬人走出來；保釣魚台時，他們會冒險去插旗，可以比臺灣走的還要更前線。即使香港人經歷過英國一百五十年之統治，表面上已經忘了何謂民主，但這就是中華文化的展現。就殖民背景而言，雖然香港僅有一百五十年的英國殖民背景；臺灣也只有五十年的日治背景；青島也有二年德國的背景；東北也有好多年滿州國及日本的背景……等等，其實中國很多華人在很多地方都曾為殖民地，為何香港會較不同？就是我剛剛講的要有英國人的廉再加上中國人的能，才能造就一個成功的典範。

教授著作之質與量頗為驚人，可謂「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師云：「文章不免講究命題、結構。其實即興下筆，意識亂



流，心猿意馬，也是自然。」師寫作過程中是否曾遇過創作瓶頸？如何克服？

個人很少遇到寫作瓶頸，因為我底下有四種文路，詩、散文、評論及翻譯，其中翻譯也是需要運用中文的，所以我一種文類不寫的時候，我會寫別的文類，始終沒有斷絕。

老師曾於數個國家或地區求學及任教，您說您的根還在，但事實上已經經過了很劇烈的轉變，是不是因為從國外吸取了很多的養分，讓您的養分不虞匱乏？

我一直是讀外文系的，又在外文系教書，但我在香港有十年是教中文系的，所以中國文化是我修養的主流，西洋文化是我修養的支流，因此多方吸收茁壯，無匱乏之說。

有些作家寫作的時候，都有一些特殊的習慣，請問您在寫作時有無特別的習慣或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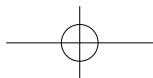
我並無如此有系統的做學問，作家和學者的角色不同，我是三分之二的作家和三分之一的學者，我的學問是在我開始教書之後，也就是被迫式的求學，因為每天要上課了，身為老師必須把要上課的主題弄清楚，這就是我成為學者的很重要的步驟，我是開始教外文系是在師範大學當講師，做學問做的很充實，因為老師考學生一個學期考兩、三次，學生考老師原則是堂堂在考，所以就被迫要讀的很仔細，因此很多人為了專業而把學問做好。我有篇文章投稿時講過一個道理，社會的文化可以推動是靠一群專業的讀者領著廣大的普通的讀者在讀書，然而專業的讀者指的是說因為他的職業而非讀書不可，如同作家為了生活、教師為了把書教好、編輯為了要選好稿子並編選節要、評論家要把別

人的書讀清楚、翻譯家得把一本書翻成中文，一定是要弄的很清楚了才翻譯得過來，此五類人便是專業的讀者，比一般的讀者讀的要負責任，因為讀不通、讀不精就會誤己誤人，所以專業的讀者是最可靠且進步最快的，當然也有一些濫竽充數的，不過原則上講起來，專業讀者是最得益處的。今天作家要寫一個題目一定是先將周邊的問題都解決了才能夠動筆，像我在西班牙看到鬥牛覺得很興奮，回到臺灣我想寫一篇鬥牛的文章，並將它命名為「紅與黑」，可是現場很多我看不太懂，回來後便開始讀大英百科全書，弄清楚為何西班牙鬥牛而義大利人卻不鬥牛？為何義大利人好勇鬥狠卻無牛可鬥？是不是少了那一種牛就鬥不成，一定要某一種牛才行？為什麼鬥完牛要將牛角和尾巴交給鬥牛士？為什麼一開始由騎馬的武士先鬥，步行的較晚鬥，最後是主鬥士出來？這些都有一套儀禮、一套理論，所以我一定要完全弄清楚了才開始動筆，這便是所謂的求學問了，你為了要寫作必定得先吸收很多進去，才能寫出與事實相符且有內容、有深度的文章。

文學與政治

歷史上許多具良知的知識份子如屈原、陶淵明、蘇軾、王陽明、于右任等人，在仕途上的憂患中，反而留下許多膾炙人口，或感動人心的詩句。請問人在顛覆困頓中，是否能培養出較好的創作力與觀察力？

以上所舉的人物中，屈原是被流放，陶淵明是辭官，蘇軾及王陽明被貶官，于佑任則是參加革命，五個人的境遇不同；古人讀書的目的原則上都是要做官，現代讀書人則不一樣，當教授作育英才也是個好的選擇。從歷史中可得知，知識份子任官往往沒有好下場，其中一個原因是社會動盪，政治波



動，知識份子在二者的夾縫之中往往容易受到傷害；另外一個因素則是戰爭，詩經裡就有許多對戰爭的描述，以讀書人而言，赴任去作官，或罷官或被貶官，大概不出這幾種原因，歷史上為官最辛苦的就屬文天祥，他後來寫了一首正氣歌，表達其心境。

有一種說法是「國家不幸，詩家幸」，一個國家有難了，寫詩的人就不愁沒有題材，大概就是不吐不快，在逆境中離鄉背景，來緬懷太平歲月，那是寫作很大的題材，詩經也好，離騷也罷，都跟這個有關係，不但戰爭，君子與小人的關係，詩經也寫到很多；現代如白先勇寫的「臺北人」也是跟戰爭有關係；張愛玲的作品，則不完全為戰爭，大部份是家庭的悲劇，尤其是社會的苦難，家庭的變遷；有的作家比較是寫個人的遭遇，有的作家是除了寫小我之外，還寫大我；至於我自己呢，因為遭遇兩次戰爭，第一次是中日戰爭，第二次則是國共戰爭；我的年輕時代就是在戰爭中度過，因此我的大學就換了三個學校，在大陸讀了南京金陵大學及廈門大學，後面的二年是在臺灣唸了臺灣大學，我若沒有早年的困境，大概就寫不出許多如鄉愁，懷古等類的詩。至於國殤那首詩，倒不是自己親身經歷；作家的作品，有些是親身經驗，可以寫實，有些是大時代的，也就是大我的遭遇，例如國殤，是描述天安門事件，雖然距離我們較遠，但現在媒體這麼發達，事發後第二天，全世界都知道。所以一個作家只要有想像力，賦予同情心，這種間接的、他人的經驗，透過了媒體的報導及個人的關心，也可以敘寫。

文學家與社會，政治應保持何種關係，方不致陷入象牙塔或深陷紛爭之中？有些政治人物喜愛寫作詩、詞（如沁園春）或以此明志（如溫家寶），老師有何評論？

政治人物引用詩來間接表達意見，自古以來即有之，詩經三百篇即是一例。自春秋，戰國以迄秦漢，政治人物習於引詩經來表達己意，因此詩與政治當然有密切的關係。此外，孫中山先生也會寫詩，他的七言律詩寫得還不錯，他曾經寫了一首「挽劉道一」的七言律詩憑弔劉道一烈士，內容是「半壁東南三楚雄，劉郎死去霸圖空，尚餘遺業艱難甚，誰與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風悲戰馬，神州落日泣哀鴻，幾時痛飲黃龍酒，橫攬江流一奠公。」辭正調永，情真意摯，氣魄恢弘，境界遠大，實為彪炳史冊之作。早期的烈士如譚嗣同因戊戌政變失敗而入獄，他當時就勸說與他一同被捕入獄的梁啟超要逃出去以延續革命之種子，至於他則留在牢中，一定要有人留在此處犧牲，有人在外面繼續奮鬥，譚嗣同當時二十幾歲，寫了一首非常壯烈的七言絕句，「望門投止思張儉，人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去是指梁啟超你逃出去，我譚嗣同則留下來擔當，你是肝，我是膽，就如同崑崙山一般，此種情操著實了不起，早期清末民初的這些舊詩都寫得非常好，個人覺得新文學家的舊詩反而寫得比新詩還好，例如魯迅，郁達夫，郭沫若等人。

早期的留學生有兩大主流，即留日與留歐美，留日者如魯迅、郭沫若，留歐美者如胡適、冰心、徐志摩等人，留歐美者大都傾向於國民政府，留日者則較多左傾者，惟不論留日或留歐美，最後領導者卻為從未放洋過的毛澤東，其實毛澤東麾下的第二、三把交椅都是留學生，如周恩來及鄧小平皆是留學法國，不過歷史上的領袖往往非高級知識份子，如毛澤東、蔣介石、劉邦及項羽等，至於學者只能做張良；講到沁園春，毛澤東做為一個詩人是很有才華，蠻有氣魄的，其實他寫的是詞，詞

在他手裡能被賦予新的生命，不管其人評價如何，他是屬於行動中人，這點與辛棄疾很雷同，甚至超越陸游，他曾經是歷史的中流，歷史曾掌握在他手裡，所以寫起詩詞來頗有氣魄，與一般寫詞之人不同，也與一般的文人不同，問題是他應該一直做詩人，不要做革命領袖，他搞文革就像做了壞詩一般，不過他若未曾經歷過革命領袖，也可能寫不出如此氣魄的詩來，在大陸，我的詩跟毛澤東的詩都在同一本詩選裡，過了一百年後再回頭來看，留下來的人不管是左還是右，是國還是共，若真有才華，還是會被留下來的，中共的領袖常有一種特質，就是自己寫詩，不會寫詩者，則引用古人的詩詞，像江澤民也愛引用詩詞，毛澤東的沁園春寫得不錯，自比唐宗宋祖，甚至還看不起成吉思汗，毛澤東就算沒有政治的生涯，光是詩人的頭銜，就足以傳後了，大陸給他的政治上定位是三七開，七分貢獻，三分禍害；但純以詩詞方面的造詣來說應該有八到九分。

現代讀書人與古代讀書人不同，古代讀書人的唯一一條正道就是為官，因為在科舉制度之下，考取了一定要做地方官。若批評朝政，則難得會遇上如唐太宗般寬宏大量之君，正所謂伴君如伴虎，是不開口為妙，因此文人參政推動改革，成功的機率頗低，例如北宋王安石變法失敗，新舊兩派皆不成功。所以中華文化中，儒家是鼓勵要兼善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就是以天下為己任，如孟子，但是往往做官不順利時，便需要韜光養晦，此時就會傾向道家，道家的哲學是可以安慰失敗者，所謂成敗不足道也，這樣想心裡就舒緩了許多，如陶淵明，歸田園去也，亦像西方的讀書人一樣，你要做正派的讀書人一定要信基督教，不過基督

教又不是那麼有趣，所以在文學上想要引用一個典故，往往就會引用希臘、羅馬的神話，但是在基督教之前也有更古老的宗教，所以一個文化總有一個正教以及另一個可以讓人們選擇的教義，雖然不在其位，亦可以使用那種宗教那種思維，或是選擇過你個人的生活，林語堂就講的很好：「中國的讀書人，達則成了儒家，窮則成了道家，皆有其安身立命之處。」像是蘇東坡、韓愈此等的文人，他寫文章的時候就成了儒家，一但遭遇貶官之後，他的哲學思想又成為了道家，可見中國讀書人也是兩種關係，就像是進入象牙塔或是介入政治紛爭，這是兩個極端，正所謂目不窺園、不問世事是象牙塔，專做學問，專做學者，這種人也有很多，像孔子是周遊列國，總是想說動一個君王施行他的仁政，孟子更是站在第一線上，可是老子就不是這樣了，莊子更是講一些虛無飄渺的東西，其道理是很深的，卻不去觸碰到政治的各種忌諱。

近代文人中魯迅與梁實秋所展現的是完全不同的文風，老師您對於兩人有何評價？

此二人頗為不同，就我個人剛才分析的，留日派與留歐美，留歐美的之中又有一例外，就是留法國的，留法的後來加入共產黨也很多，留日的裡面像陳獨秀等等也是都是後來走左派的路。魯迅介入現實比較多，對於中國文化較持否定的態度，他認為儒家的文化就是世人的禮教，諸如此類，後來像李敖、柏楊他們都是繼承魯迅的說法再一路講下去，那麼梁實秋他到底還是受過西方教育，在美國碰到了白彼得，白彼得是反浪漫主義，主張理性，所以梁實秋及胡適他們是不主張革命的，主張漸進的民主、自由主義，魯迅是支持革命的，因為共產主義輸入中國主要是從日

本輸進來的，無論是西化文學上的浪漫主義，或是社會思想的共產主義，都是先到日本然後再傳到中國，梁實秋和胡適是西化派，是講究民主社會自由主義的份子，而魯迅及陳獨秀則是主張革命。

有些文人以革命文學做出發，幫助窮人批判政府，事實上他們自己反而脫離了窮人的階段，然而，當時革命軍退到臺灣處境非常困難，有些文人基於大局或基於愛國心幫政府講話、寫文章，事實上生活卻過得很艱辛，這好像也變的很吊詭，因替窮人出聲令生活變好反而脫離了窮人的階段，到最後他們寫作到底是基於窮人的角度還是說考慮後來經濟市場的考量？

贊成革命、反對貧富差距或者反對資本主義而言論非常劇烈，但自身生活又過得優渥，這樣子的人是有的，舉個例子如蕭伯那，是社會主義者，他批評英國社會的種種弊端，可是他的生活卻過的不錯；另外像是甘地，不鼓吹革命，可是他的不革命比革命厲害，他向英國採取不合作運動，即我不反對你、可是我也不跟隨你的作法，結果他的生活是最清苦的，像個宗教領袖一般；另外一個受到甘地影響的人是托爾斯泰，托爾斯泰是貴族出身，他的太太也是貴族，可是後來他發現農民的生活如此困苦，於是就決定跟隨農民過同樣的生活，把稿費給退了回去，要做道德上的聖人。此外也有像是耶穌、釋迦牟尼這類的也就更偉大了，也有一些是站在邊緣上指指點點罵政府的，批評社會，可是錢財來了也不反對，蕭伯那就是這樣一個很矛盾的人，關於他這種矛盾的笑話也很多啦！像是有一次蕭伯納在倫敦演講，講的是社會不公的主題，講的群情激動，指著門口那台漂亮的車說，就是不該開那樣的

車，當大家生氣的問是誰開那樣的車，結果是蕭伯納本人開的，他滑稽的地方也就在此，當然像托爾斯泰這種的最偉大，不過我也對托爾斯泰有所批評，就是你個人要做聖人，卻把週邊親人的生活也一起犧牲了。

詩與革命的浪漫

許多革命者常以詩敘情，煽動革命，如毛澤東、阿根廷詩人切·格瓦拉等等。人心困頓、浮動的時刻，簡潔詩語，扣人心弦，最能震撼人心，驅動勇氣，教授能否表達您的一些看法？

詩與革命的共通點在於「浪漫」，相較於改革或君主憲政等這類務實、漸進的政治行為，革命是一種浪漫的政治行為。所以如胡適這般理性的人不贊成革命，「少談革命，多解決問題」是他常為後人引用的一句名言，若只是一味地鼓吹革命，而不深入地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到頭來也只是留下一個空洞的口號。革命家具有憂國憂民的情操，能夠寫出慷慨激昂的詩是很自然的，然而，就我們文人對詩的看法，詩不一定是如此激情的。一名詩人情感的激動，不至於超過革命家、宗教家，甚至報章雜誌上緋聞案的主角；反之，詩人是文字的藝術家，他能夠透過文字將自己深刻的情感表達出來，革命家與宗教家倒未必能善於應用文字。由於詩人留下非常多令大家印象深刻的作品，一般人因此覺得詩人的情感澎湃激昂，其實詩人的感情與一般人一樣，不同的是詩人能夠在激情過後，能痛定思痛，好好分析自己的情感，這種經過沈澱、思考過後的情感，是能夠比較持久且細膩的；而革命家一時的激情，反而是比較粗糙的。

文學與司法

秋暮（師作）：「黃昏黃昏你慢慢地燒、落日落日你慢慢地沉、天高高、地冷冷、雁在中間叫一聲」，真是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亞里斯多德曾說詩比歷史更真實，怎樣的文學方能在真實與優美及想像中取得平衡？司法文書可從中得到何種啟發？

司法文書不應取法於詩

司法文書是冷靜的說理，甚至犀利的推理、邏輯思考，並不適合抒情。一封判決書若太過抒情，一般人看來會覺得你在感情用事，過份自由心證。中國人講「情、理、法」，司法亦須合情合理，此「情」意為「常情」、「人情世故」，既不是男女之情，也不是革命的熱情。革命是在亂世之中不得以採取的手段，而司法則用於治世，可以用法律來解決問題的時候，就不需要革命。雖說人們可以寄情於詩，但司法文書需要的是冷靜的邏輯思考，不應該取法於詩。

有人說司法文書太過文言、官僚，應該學習大陸用白話文，這樣老百姓才看的懂，對此老師的看法為何？

各行各業都有各自的專業術語，現在最熱門的例子就是醫生應該用英文或中文來記錄病情。我覺得司法文書應該用措辭明瞭的白話，或是簡潔易懂的文言文來表達。小時候還沒有電視，媒體，我們課外唯一的娛樂就是看古典小說，那時的古典小說，文言比較淺近、白話比較簡潔。當時的白話與現在大相逕庭，現代的白話是受到西化影響下扭曲的白話；當時的白話較接近文人的口語，又與一般人日常對話不同，我們那時候的小孩讀了這些小說，中文自然而然就學得好，這是介於白話跟文言之間很好的語言。

我國傳統法學教育，法律系學生所學習的是背誦式的法條，思維僵硬刻板，處理相關社會問題未盡符合社會期待，國人對司法常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一般皆歸咎於司法人員欠缺人文關懷素養，請問教授對我國司法制度、司法教育、司法文書有何建言？

司法文書應淺顯易懂、說理明白

除了報紙上一些重大案件的判決，我很少接觸司法文書，我曾經到臺南跟高雄地方法院演講過，但是真正進法庭的經驗只有兩次：一次是有一個作家告我，那時我有一本書，出版的書店倒閉了，我把書拿到另一個書局出，他就告我一書兩出是詐欺，要我拿一百萬出來擺平，我不願意，於是我花三萬塊僱一名律師幫我打官司，到後來打贏了；另一次是出席香港法院的判決，我有一位學生被別人誣告，我去為他作人格證人，證明他是一位正人君子。所以我對司法文書的了解是很有限的，不過我相信，現在的判決書往往篇幅很長，若再用累贅不堪的白話來撰寫，反而會讓人看不懂。許多學者寫的書，說理不清楚，就是因為他用過度西化的中文來撰寫。比如說，「兩岸關係很不穩定」，西話的說法會說「兩岸目前的關係充滿了高度的不穩定性」，乍看之下似乎很有學問，其實也看不懂，利用西話的說法打扮一下，反而讓大家聽得糊里糊塗，所以司法文書應該盡量利用說理明白的淺近文言，或是經過濃縮、淨化的白話文方能達到淺顯易懂、說理明白的功用。

老師有無至法院洽公的經驗、對法院的觀感如何？

我上法院的經驗還不錯，當時那位作家告我，要開庭之前，臺北地方法院通知我過去面談，作開庭的準備。我看到是詐

欺罪，非常不高興，於是我寫了一封信給法官，說我一生中沒有詐欺過別人，而且你指定的期日我有事不能赴約，法官就為我延期兩個禮拜再面談，面談時我坐在法官旁邊，有一位錄事問我一些問題並記錄下來，等到要開庭時我就與我的律師一同到法院，之後再開庭便是我的律師代我出席了。大概法官都知道我在大學教書，還蠻禮遇我的。

老師對臺灣司法制度的觀感、以及需要改進的地方有哪些？

多與民眾交談、傾聽人民心聲

我們夫妻倆在家看報紙也常常討論，明明某個人就有很多不對的地方，檢調處也找到證據了，法官卻從輕發落；又例如性騷擾的尺度問題，規定要超過某種程度或秒數才成立等等，我認為太過勉強。大家都希望社會安定，真正的壞人可以得到懲罰，如果過份寬恕，就不符合人民的期望，例如現在發生很多弊案，為了這些弊案，民眾在媒體上群情激憤，法官最後若從輕發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民眾一定會感到非常不滿。對於某些法規程度上的界定，民間應該有一些共識，法官及司法人員或許應該多跟一般民眾多交談，才能了解人民的心聲。

文學與教育

臺灣政府如何成為有廉有能的政府？

取法新加坡與香港、建立廉能政府

對於廉能的政府，在華人世界裡，有兩個國家值得我們學習—新加坡與香港。對某些臺灣人民而言，香港不過是一個殖民地，而新加坡則比較獨裁，但是他們的法治的確比較先進。新加坡政府就稱的上廉能，雖然言論自由的程度比較差，民主制度也沒那麼先進；而香港則是英國人的「廉」，加上華

人的「能」，例如具有英國留學背景的李光耀以及他的團隊。臺灣無論是在廉或能，都尚嫌不足。我有很多朋友，假若要他們選擇，他們未必會選擇住在新加坡，但是你在新加坡，就會對新加坡的治安感到非常安心。又比如說，我們在加拿大買房子，只要交給律師，他自然會幫你處理妥善，完全不會發生糾紛；在臺灣買房子則不然，總是會因為處理過程不清楚而產生一些不必要的糾紛，銀行貸款也是如此…諸如此類。臺灣的民主與自由已經足夠了，甚至有些地方到了氾濫的程度，但是法治的程度卻尚未完整，所以是跛腳、不健全的。因此，教育還是非常重要的，對於國中、小的學生，把這方面的利害關係及知識灌輸給他，對法治觀念從小紮根，而非完全講吾愛吾鄉，這些空洞的口號而已。

現代的父母在孩子很小時就開始讓他們學習英語，咸認為不能輸在起跑點，老師是否贊成此等作法？

學習英文，起步早未必佔便宜

現在很多家長相信，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只要起步快就可以佔到便宜，其實不然。我那個時代，是初一才開始學英文，我亦是如此，但並不會有太大的落後。小朋友還小的時候，中文尚未學習好，心智還沒成熟，你就要他多負擔一種或兩種外語，也不見得有效。早讀外文對於說跟聽有幫助；而讀與寫必須透過頭腦思考，需要思考的東西，早讀未必有幫助。再者，學習英文也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例如日常的會話、與人交談，或是深入閱讀西方文化的歷史精華。英文要能精進，西方文化的背景必須越深厚，一定要讀懂其文化背後的含意，才能明白其源由。舉個例子，希臘的文藝及宗教史中，有一種神叫繆思

(Muse)，繆思女神為九個姊妹神祇，分別掌管歷史、宗教、戲劇、詩歌、音樂等等，是文藝的女神，而繆思除了在希臘神話中掌管文藝跟文人藝術家的靈感之外，祂本身就代表詩，英文「Music」音樂、「Museum」美術館，就是從這個字演變而來的，若是能夠知道這個字的來源、文化的起源，則對於學英文、學西方文字，就能有系統、有來歷地學習，而不是去死記一個生字。

現代國文考試試題支離破碎，作文方面，學生又都以套用範本或八股因應，對於此種現象老師有何看法？又對於國內語文教育有何期許？

國文學習之困難在於其範圍甚廣，包括文言文及白話，至介於文、白之間的語言，包括翻譯，也都是國文的一部分，後來加入西化的因素，所以變得異常複雜，我常跟學生開玩笑，我說你們覺的文言文是很落伍的東西嗎？現在英文 sex harassment 大家都說是性騷擾，那古文有無此種說法？當然有，可是古人如何講述這件事情？他們稱為「調戲」，調戲就是性騷擾的意思，不論是言語上或是肢體上皆屬之。所以很多用詞古文即有之，並非新觀念或是從西方而來的，諸如此類，所以國語文能力是日積月累而成的本能，有此能力者，一下筆自然文從字順，但這是最起碼的要求，不要講文采怎麼好法，很自然的，就是一句接著一句，不會有繞口或難讀的地方，古文寫成往往就是偶數的四個字，不會三個字或五個字，我也常跟聽眾說，我們雖然不用文言，不過文言並沒有因此作廢，因為我們只要讀過書，每天講話就要運用到幾百句，甚至上千句的成語，成語就是文言改變一個身分，成為精華留傳下來，

比如說張三李四這句成語，也沒什麼學問，意思就是每個人，可是為什麼我們不說是張四李三？就是因為張三是平聲，李四是仄聲，自然讀起來就舒服，我們說千方百計，沒有人說他千計百方要害我，因為千方是平聲，百計是仄聲，千方百計如此，千山萬水也是如此，用這個模型來分析很多成語，都有中文基本的美學，指的是簡潔、鏗鏘以及對照，這是成語的三要件，這點說明了我們耳朵幾千年來已經習慣了簡潔、鏗鏘、對照的說法，違反了這種說法你就覺的不順，就是這麼簡單，真正停下來想一想，上千句的都是如此，那就是說以前的讀書人，他要讀三字經，千字文，就是鍛鍊他對中文的平仄。

現在的學生都用劇本、公式性的套入至文章中，甚至還會自己分類，例如勵志性的、抒情文，他們有一套自己的文庫，就這樣的整個套用，或是用八股文應對，這對國語文教育之利弊為何？

我認為那不過是應付考試而已，真正的作文之道除了語文的控制之外還有思想的培養，除了文筆要流暢，思想是否清晰更為重要，想的清楚才能夠寫的明白，如果倒過來只是有幾個範文，僅以這幾個範本，等到碰到問題就把它套用進去，很多時候是行不通的，有時候運氣好固然還可以，有時候便會牛頭不對馬嘴了。

思想清晰，是我們國人的弱項，因為我們沒有這方面的訓練，所以在討論事情時到後來都失焦，雞同鴨講，無法理解對方在講什麼，例如政治上的辯論從來都沒有焦點，老師有何看法？

學習過作文的基本訓練後，可能文章會寫的還蠻通順、蠻漂亮的，可是後面思想模

糊，不合理，那就是很大的毛病，所以梁實秋曾說，他以前在學校寫作文，老師不改文章，只是將囉嗦的字眼、拐彎抹角的詞句等贅字的刪掉，再放回來一看，文章則變的很通順，原因就在於不是你說不出來，而是你想不清楚，才會用一些不必要的字彎來繞去，所以應該要注重「簡潔」，假若不懂一些好的文言，就不知道何為「簡潔」。

文章簡潔應如何訓練？有人曾說過成語是一種思想的懶惰，對此老師看法為何？

「成語是一種思想的懶惰」，此種說法非完全錯，可是大半不對，一個人文章要寫得好，不能用太多的成語，因為這樣就像是古人在幫你說話，你不過是古人的意見箱而已，倒過來我認為完全不用成語也行不通，應該適量的運用成語，所以前教育部長杜正勝說成語是懶人的習慣，不是如此，就如同我之前講的千方百計、張三李四，這固然是淺顯的成語，不過有一些成語其實它的層次是很深的，有的是典故，或是以中華文化的地理、歷史做為背景，諸如此類，例如「得隴望蜀」，你不知道隴和蜀的地理位置與軍事價值，也就不會知道為什麼會引申為貪得無厭；「朝秦暮楚」你不知道當時秦和楚的關係，也同樣無法理解其含意，「唇亡齒寒」、「暗渡陳倉」它們也都有其各自的歷史背景，然而那些沒有歷史背景的，只須概略的閱讀字面，你就會了解它的意思，可是那些後面有故事和背景的成語其實是不簡單的，你要去理解、消化，接著善用它，絕對不是個懶惰的人，像是報紙裡的社論、專欄，每天都有很多的成語，而且成語要用的恰當不只是一要用它，還要了解它後才可加以修改，用那個成語的模式換一個字，就有新的意思在裡面。

這一代年青人的電腦能力都很強，可是在文字的運用能力上反而退化了，請問老師該如何培養這一代年青人在文字上簡潔的能力？

現在年青人都是用上網或是手機編輯簡訊發文，大都是很匆忙、很簡略的，沒有好好的思考及寫作，即使寫了很多，但都沒有進步，沒有鍛鍊，因為現在的媒體太複雜，引誘力也太大了，要學生坐下來好好思想好好寫作，也漸漸都辦不到了。

另外流行的小說、書類固然有很多人在看，可是有時也會有壞的影響力，如果文筆的基本表達都不夠的前提下，去學習暢銷書的寫作方式，中間還是有段落差。有些暢銷書的作家是文筆很熟練了之後才來做變化，但如果是基本表達不夠的時候就來做變化，是不健康的，不論是父母、老師或是媒體，都要多多注意這些事情。

關於教改 98 課綱「文言文」比例一直在降低，老師於多次座談會中皆表示反對，請問老師，「文言文」在語文教育中的重要性為何？

我常到高中去演講，和高中生接觸很多，也有很多高中生來我家請教我，而且我的十本散文被大陸選入課本裡的比臺灣還要多，新加坡、香港也有，目前兩岸教科書的內容也不一樣。總之大陸對於文言文還是很強調的，甚至小學就要開始背誦很多古詩，基本上都是經過挑選比較淺顯的，大陸的教科書有三個單元，第一是文言，第二是白話，第三則是翻譯，是將世界各國的童歌、童話、短篇故事翻譯成中文的一種新的內涵，並納入教科書成為總體三分之一的內容，所以小學生從小就知道丹麥的童話是什麼，或是利比亞的故事，有英美蘇聯等大國，或拉丁美洲等小

國，這些都是它的來源，所以他們是三元我們是雙元，雙元之中本來是 65% 的文言比 35% 的白話，杜部長那個時候一口氣將比例反倒過來，也就是 65% 的白話比 35% 的文言，我認為比例稍稍調整還可以，比例若倒過來則太過，畢竟文言是二千多年的取材，白話不過是九十年的歷史而已，所以古人有那麼多智慧結晶的傳承，我們不但要學它的語言，更要學它的智慧，而不是網路上搜尋，隨意點出一段文言就可以了解它的含意，我們當初在搶救國文就是為了這個，我們的國語文教育，文言目前的上課時數是一星期四小時，大陸是七小時，香港也比我們多，所以臺北縣的周縣長為此感到憂心，於是將臺北縣的國中小時數改為六小時，並邀請我當臺北縣的語文教育顧問，並出版了六本韻文的課外讀物，也就是教科書之外的詩經、楚詞，一直到民國以來的歌詞，最後還將它免費地送給當地四十萬學童。

老師到過的地方很多，所以想請教的是，您覺得大陸、香港、美國等地華人的文風和我國的有何不同之處？

這其實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這幾個地區各有各的背景，本來中華文化的水平應該是大陸獨領風騷的，因為它是中華文化的搖籃、基地。可是從 1949 年到現在他們浪費了太多時間在批判中華文化，尤有甚者係後來發生文化大革命。那時候的臺灣，政治上並不是很開明，可是對於中華文化基本上還是保持著尊崇的態度，所以造成現在兩岸有一定的落差。大陸急起直追想儘速收回中文的發言權及中華文化的主導權，因此在百家講壇上才會出現如于丹這類的人，于丹等人的出現並不表示對岸比我們對更熟悉儒家，而是他們能使用比較淺近的語言，在黃金時


段吸引很多聽眾，這些聽眾往往是失學的一代，就是文革或文革之後沒有辦法親近中華文化的人，現在一聽起孔孟之道反而都覺新鮮有趣，透過簡化的方式說起來亦更為生動，所以看起來文學好像很發達的樣子，大陸為了統一，繼承中華文化也有它的好處，只是他們的語言和我們的早已相去甚遠，我曾問大陸的學者您的夫人沒有來嗎？他說夫人在家中陪我的公子，我們會覺得莫名其妙，因為他們已經把妻子丈夫叫「愛人」叫了六十年，所以「夫人」該怎麼用他們已經沒有概念了，很多地方講話已經摻雜了西方用語，可是回到中華文化上又可以交流，所以一般大陸人士來訪時就會覺得臺灣人很有禮貌、很有文化，反過來說，他們沒有禮貌沒有文化。以前鼓勵人民鬥爭，現在很多機關衙門上面釘一個牌子叫「文明單位」，表示以前是野蠻的，什麼叫文明單位，就是不鬥爭了講究實際工作的效力，講究禮貌就是文明，可見鬥爭了這麼多年又回到了和諧社會文明單位來，以前的解放和現今的開放在思想上的形成了矛盾，所以現在大家心裡都有數，在媒體上也就不敢隨便發言。

老師您覺得目前臺灣的文學水平是否還能獨領風騷？

我認為不一定，大陸的媒體很發達，北京的中央電視台有二十一個頻道，這個範圍非常的廣，我到很多都市去，他們當地的上海電視台、東方電視台、湖南衛視，每一個省會都有好幾個電視台，在這方面非常的普及，也是他們的優勢。

老師為何選擇高雄作為久居之地？

朋友常問我，為什麼當初會選擇高雄，我的回答是：「不是我選擇高雄，而是高雄選擇了我」。民國七十四年，我離開居



問我為何住在西子灣頭 只因滄海是我的鄰居
吞吐潮汐 以海為師
樂山樂水 智仁兼備
發揚壽山的朝氣 珍重西子的晚霞
唯你的視線無限 能超越水平線的有限
這世界待你向前推動 像鉛筆旋轉在你手中
余光中，獨立詩

住了十一年的香港，應國立中山大學之聘，遷到高雄市定居。因為當時中山大學創校校長李煥先生，於創校之初積極延攬人才，欲聘我為文學院院長兼外文研究所所長，那時也正是香港菁英份子因面臨九七回歸，害怕中共統治紛紛出走的年代。由於香港部分人士出走的原因，所以李校長認為此刻是將余光中請來的大好機會，當時我住在臺北來來飯店，李煥校長知道後便專程來到飯店找我，並勸我回來，接著第二年我就回到了臺灣，很多人認為當時我會移居美國或加拿大，回臺灣的可能性不高，即使決定回國，也應回到熟悉的臺北，一旦決定遷來毫無淵源的高雄，著實令許多人訝異。來到高雄以後覺得這裡也蠻好的，所以也將父母接到高雄來長住，這麼多年來高雄已是我居住最久的城市，已經超越臺北，在此處生活還不錯，也結識了很多當地的朋友。

請問老師對於未來對臺灣在文學方面的期許以及建議為何？

全世界學中文的人愈來愈多，未來非中文人口可能有上億人都趕上學習熱潮，雖然是為了貿易、賺錢，但也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現在連中國都懊悔過去文革的破壞，臺灣在國文程度上更不應該輕易放棄。

我尤其希望現在的政治人物要多讀書、多讀一些詩，培養更多的文化素養。人們也應該平時培養閱讀的習慣，並在讀後思考其內容加以吸收，平時多練習寫作，只求語句通順，文筆表達清晰，以增進國文能力。尤其對寫作興趣者，更須多方取材，將題材與內容融會貫通，寫出足以撼動人心的作品，提升國文品質，發揮國文之美，願大家共勉之。

（本文由許智惠、王琮仁、張宏瑞記錄整理）